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军人”形象研究^{* 1}

——以山崎丰子的“战争三部曲”为例

鲍 同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提 要: 战后日本文学的许多作品开始涉及现实,不少作家以“军人”为对象,运用写实主义详细记述他们的工作、生活,内容涉及战前、战时和战后。山崎丰子是代表作家之一,作品中尤以“战争三部曲”最具特色,其中对“军人”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尘封历史,引发社会讨论。但是,作为日本作家,山崎仍不能摆脱“崇拜”、“史观”等思维定式,人为地将战后的“军人”色彩平淡化、命运悲情化,并通过非常化的故事结局进行文学创作,干扰读者的文学接受和历史认知,影响作品的国际传播,不利于日本与其他国家在文学、文化等方面的正常交流。

关键词: “军人”形象; 山崎丰子; “战争三部曲”; 历史反省; 作家责任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7)05-0123-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5.021

A Study on the Image of “Soldiers”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 Based on Toyoko Yamasaki's *War Trilogy*

Bao To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rea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heme in many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in which writers try to give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work and life of soldiers in pre-war, in-war and post-war period by applying the technique of realism. As a representative novelist, Toyoko Yamasaki is renowned for her *War Trilogy* in which the depiction of soldiers can not only reveal dust-laden history, but also give rise to heated public debate to some extent. However, as a Japanese writer, her mindset is restricted by the concepts “worship” and “historical view”. Thus, she intentionally made dilution of the coloring of “soldiers” and plotting of their melancholy destiny. Her unconventional ending in writing interferes with readers' reception and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hinders the works'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and does harm to the smooth communication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etween Japan and its Asian counterparts.

Key words: the image of “soldiers”; Toyoko Yamasaki; *War Trilogy*; reflection on history; writers' responsibility

1 引言

自古以来,日本文学具有“超政治性倾向”,女性文学更偏好风月,少问政事。但是,二战之后的日本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开始大胆涉及政治,作家通过文学作品书写战争,意在揭示历史,引发社会思考。“文学作为重现与消解历史的载体,被认为是再现历史的最佳媒介”(丁跃斌 2017:

121),日本现代文学中存在很多“军人”形象,人物活动既包括战争期间,也包括战争前后。

山崎丰子作为日本女作家,在“寡作期”(1973-2013)的约四十年里,坚持长篇小说的文学创作,偏好现实主义题材。在此前“尝试期”(1957-1958年)、“发展期”(1959-1964年)、“巅峰期”(1965-1972年)的各阶段文学创作中,她的作品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学运动后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研究(1919-2018)”(17BWW032)的阶段性成果。

几乎均有“军人”形象出现,最早可追溯至第二部长篇小说、直木奖获奖作品——《花暖帘》。但是在“战争三部曲”——《不毛地带》、《两个祖国》和《大地之子》之前,“军人”并未成为主要描写对象。在历时近20年创作的“战争三部曲”中,山崎将“军人”作为主体进行书写,从人物心理到语言,既描写工作,又记述生活,战后时期是写作的重点。

2 “战争三部曲”中的“军人”

2.1 《不毛地带》的一岐正

《不毛地带》的主人公一岐正生于1912年,15岁开始先后进入东京陆军少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21岁担任日本陆军少尉,后进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于陆军部作战课等处任参谋等职。1945年,一岐被派往中国东北地区,后随投降日军被送至西伯利亚。经过11年的劳役生活,一岐于1956年回到日本,进入近畿商事工作。凭借个人能力,在商界屡创佳绩,地位迅速上升,仅用16年便由一名普通社员跃升至副社长,成为近畿商事的二号人物,实际的掌舵人,下任社长的不二人选。

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一岐的军旅生活以倒叙的形式、通过回忆、联想等方式展现出来。在全书32章中,仅有8章涉及一岐的军人生活,讲述个人经历,揭示性格形成,为他在近畿商事的各种活动做出铺垫。从中可以看出,一岐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以“军人”的身份和个性度过的。即使回归社会,其言行仍充满“军人”色彩,内心保有军政时期理念,因而无法完全过普通人的生活。

2.2 《两个祖国》的天羽贤治

《两个祖国》的主人公天羽贤治20世纪初在美国洛杉矶出生,是第二代美籍日裔。从小学3年级到中学毕业,天羽在日本鹿儿岛接受教育。重回美国后,天羽成为当地日文报刊《加州新报》的记者。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天羽与众多在美日籍、日裔一起被关进沙漠中的战时收容所,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美军劝说下入伍,进入由情报部成立的日语学校,培训美军士兵日语,还曾作为外语兵直接参战,为美军破译情报。二战结束后,天羽随美军来到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监听译员,审判结束后,天羽深感受美日双方怀疑,身心俱疲的他最终在空无一人的法庭内吞枪自尽。

与《不毛地带》中的一岐相反,天羽短暂的人生一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度过的。时局动荡之际,不得已加入美军,本以为自己美籍日裔的身份

能有助于美日关系的缓和,以减少甚至避免灾难的发生。然而,看似可以成为两国纽带的他,最终反而无法获得任何一方信任,甚至因此失去亲情、友情和爱情。天羽生前虽未真正获准离职,但他早已厌恶军队的种种行为,决意与之划清界限。自杀虽显无奈,却最大限度地表达了他的抗争情绪。直到离开人世,天羽仍未能认清战争的本质,为此长期备受煎熬,身心俱疲,由此反映出二战前后众多美籍日裔的共同苦恼。

2.3 《大地之子》的松本耕次

《大地之子》中的松本耕次是日本长野县人,受到日本政府鼓动举家迁往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所谓“拓荒工作”。作为早期侵入该地的日本人,松本成立长野县民众会,继续召集在日民众。随后,他应征入伍,随日军侵略中国南方。二战结束后,松本侥幸回到日本,却将妻儿留在中国东北。逃难途中,妻子、幼子死去,长子胜男、长女敦子被中国人收留,生活在农村地区。敦子取名张玉花,因病早逝;胜男被陆德志一家收养,取名陆一心。退伍后的松本进入商社,20世纪80年代开始参加中日合作钢铁项目,担任日方上海事务所所长。在华期间,偶遇陆一心,劝其回日,未尝所愿。

小说中,松本是除陆一心外的另一条主线,它与陆一心线索部分重合,独立成章,辟径各表。因“军人”身份,松本的人生轨迹受到战争影响,精神层面留有战争伤痕,尤其是战后得知妻儿或悲惨死去,或远隔千里,松本万念俱灰。这也引起松本及与他具有相同经历的人们的思考:作为日本军人在助纣为虐成为历史罪人的同时,也葬送掉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即使侥幸留存于世,重逢亲生儿子,并企图通过实际行动弥补过错,都无法完成自我救赎。(鲍同 姜毅然 2012: 117) 长子陆一心等众多战争遗孤的出现,正是松本这样的“军人”一手造成的;战争遗孤的存在,反证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是对日本军人、日本政府的有力质问。

3 “军人”形象的文学特性

与传统文学不同,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军人”具有特殊身份。“他们”经历过战前、战中和战后,而战后是作家描写的重点,主人公通常会被褪去人物“军人”背景,反而突出悲情色彩、冠以悲情化的结局。山崎丰子的“战争三部曲”便是如此。

3.1 “军人”色彩平淡化

“战争三部曲”中的“军人”数量庞大,身份不同,个性鲜明,命运迥异。作为拥有近15年记者经历的社会小说作家,山崎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平

民化,刻意将人物塑造得平实、鲜活,以弱化“军人”身份。为此,山崎将笔触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中,描写他们于日本投降之后的社会活动。

在《不毛地带》中,除一岐外,还有川又伊佐雄、兵头信一郎、秋津纪武、秋津清辉、谷川正治等“军人”,他们或在日本军校、或在侵略战争时期与一岐有过交集。战后,有的接受审判,有的从商从政,有的赋闲于世。除热衷石油开发的兵头和西伯利亚日本劳役者团体“朔风会”会长谷川外,一些人引咎自缢,一些人皈依佛门,这是战后日本社会中“军人”的真实写照。

为进一步淡化这些人物的“军人”身份,山崎在连载过程中不断修订写作方向,尝试将这些人物的活动变得“高尚”:为所谓的“国防需要”,一岐甚至反悔誓言,以代理商的身份投身到购买军用战斗机的政府活动中;在《两个祖国》中,天羽从参加太平洋战争担当情报员,到以战胜国军官身份进驻日本,再到以监听译员的身份参与审判,虽身在美军,却时时挂念日本亲友,甚至天真地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帮助受审人员;在《大地之子》中,松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怀揣复杂的心情来到中国,希望通过援建中国增进两国友谊,补偿过往。这些描写使“战争三部曲”中的“军人”逐渐摆脱负面形象,令读者误以为战后“军人”是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2 人物命运悲情化

“坚毅”是日本民众对“军人”的一般认知。但是,在“战争三部曲”中,山崎重视对战后“军人”的感性描写,屡次出现他们动情落泪的场景,借“物哀”突出人物命运的悲情化。

“物哀最显著的特征是蕴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已经成为文学心灵价值符号的代码。”(张锦 2016: 174)在《不毛地带》中,一岐曾经无数次濒临死亡,无论是在西伯利亚长年劳役,还是担任近畿商事要职面对生死攸关的商战,他都毫不示弱。然而,当他踏上返回苏联、寻找日本军人遗骨的旅途时,却“落下大滴的泪水”(山崎丰子 1983: 622);在《两个祖国》中,曾因日本人身份被关押的天羽自由受限,忍受凌辱。在加入美军之后,天羽仍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然而,无论生活条件怎样艰苦,工作环境如何简陋,天羽从未气馁,仍鼓起勇气坦然面对。但是,当他接到有关幼时挚友椰子尸检的信件时,内心泛起涟漪,“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信上”(山崎丰子 1986: 568)。在《大地之子》中,失去妻儿、等待孤独终老的松本,在生活上、工作中无论怎样不如意,都

会坚强度过。然而,当他面对阔别数十载的亲生儿子、聆听其在不同时期的各种遭遇时,“松本无法言语,泪眼滂沱”(山崎丰子 1994: 44)。悲剧情节符合日本受众的审美情趣,“泪水”柔化主人公个性,令故事显得真实。但是,作为战后“军人”,他们的动情会令一些读者产生误解:这样的泪水是否带有忏悔之意。

不仅如此,山崎还沿用日本传统文学的物哀手法,以倒叙、插叙的方式将3位人物的妻子命运描写得十分坎坷:一岐于事业攀升时,目睹含辛茹苦的结发妻子遭遇车祸、不治身亡的全过程。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天羽的妻子惠美子在战争期间留守美国,于加利福尼亚州经营旅馆,在白天出行时被美国白人奸污,此后一蹶不振,每日借酒消愁;松本的妻子同日本侵略者一起来到中国东北,于战后带领子女开始逃亡生活,客死他乡。作为普通民众,主人公妻子的悲惨命运会影响读者的理性判断,日本“军人”的战时罪行甚至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宽恕。

3.3 故事结局非常化

作为社会小说,“战争三部曲”在塑造“军人”形象的过程中,未对战争本身和军人行为作出合理解读,甚至忽略战争责任。3个故事结局的非常化体现出这一点。

首先,故事以一岐、天羽、松本身处异地作为结尾:一岐以一己之力扭转公司不利局面,却在公认即将继任社长之际急流勇退,甚至暂时放弃重组家庭,以“朔风会”会长的名义只身前往西伯利亚,找寻遗骸;身为美军军官的天羽踏上战后的日本国土,亲历东京审判整个过程,却被怀疑对美国不忠,遭到审查,还被强行调离岗位。长期的内心压抑使天羽疲惫不堪,拥有日本血统的他却因美籍身份在日本毫无立锥之地,最终导致精神崩溃;松本在经历各种波折、完成宝华制铁中日合作项目的相关工作后,并未立刻返回日本,而是留在中国与众人游览长江,目的是为说服唯一幸存的亲人——陆一心回到日本,却未能如愿。这种故事结局很难将受众的理性思维引向历史反思,缺乏对人物因何而来、为何而悲等前提性、逻辑性问题的思考。

4 “军人”形象的来源与社会影响

4.1 形象来源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军人”形象特点鲜明,人物形成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双重影响。起初,山崎丰子并未对相关人群产生写作灵感,而是

通过在美国、中国的学术活动偶然获得信息,产生创作冲动,凭借作家敏锐嗅觉,以访谈、查阅资料等方式充分调研,深挖隐藏信息。“战争三部曲”的外出调研时间累计超过10年,其中《大地之子》的时间最长,共约四年。期间,山崎辗转中国吉林、宁夏、内蒙、上海等数十个地区,访问劳改部门、钢铁工厂等处,获得相对真实的一手资料。此外,山崎还在各部作品的文末附有参考文献,3部作品参考资料共约四百余部(篇),访谈约二百余人,走访日本及海外机构近百家。可以说,山崎笔下的“军人”形象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在调查的基础上,山崎进行艺术加工。山崎的思维方式受社会环境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体现在作品中有两个特性,一是“崇拜”,一是“史观”。

在“战争三部曲”中,山崎沿袭女性作家描写男性形象的惯用手法,将“军人”塑造得高大坚毅,符合日本普通女性的“仰视”习惯。一岐、天羽、松本在战后化身为“社会中坚”,甚至成为英雄式人物。这种英雄崇拜,受到武士崇拜的思维定式影响,作品中更多的表现为突出“军人”的“忠”,隐藏他们的“恶”。其次,山崎在作品中植入“遗骨崇拜”情节。日本学界通常认为,日本对遗骨的崇拜始于1937年前后,政府不仅负责将遗骨运回、归还给家属,还组织祭祀等活动,甚至在战后的十余年间前往太平洋各岛屿进行遗骨收集,并与苏联交涉送还劳役人员遗骨、协调亲属前往苏联扫墓等事宜。(山折哲雄 2015:3-6)山崎生于1924年,了解日本政府对死亡军人的处理过程,并将其引入作品当中。

对“军人”战后生活的描写,体现出山崎片面的历史观。一方面,一直在日接受教育的山崎无论怎样厌恶战争,仍不能站在反法西斯、反侵略的高度去审视战争,追究日本政府。“战争三部曲”中有多处责难苏联军队,甚至通过“军人”的言行表达出应将美国投放原子弹的行为定罪的意图,这些有悖于普世历史观的痕迹比较明显,对抗国际社会战争观的倾向十分严重,属于质疑东京审判观点的文学书写和个人情感表达。

4.2 社会影响

日本现代文学作家通过写实主义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表现社会场景,描述战后日本,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为强化作品的真实感,山崎长年前往国内外各地进行取材工作,身体力行,影响社会。作品中的部分真实信息,能够帮助日本

民众提升历史认知水平,具有对日本学术活动、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信息补偿功能,回应一般民众的获知诉求,体现出“平民作家”的社会责任,为日本社会小说文学创作开辟出新的途径。但是,如前所述,其历史认知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对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未能进行由表及里的客观分析,作品中对战争责任的指向性模糊,偏差较大,缺乏对“军人”一针见血的直接质问,影响日本读者的史实接受。

从国际视角来看,山崎笔下的人物,如一岐、天羽、松本等人缺乏正义品格,较难成为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受到限制。由此可见,日本作家若以写实主义描写日本“军人”形象,必须借鉴国外史料,建立日本民众与国外民众的沟通渠道,互通有无,通过文学活动传递日本民众友善之意。

5 结束语

本文以山崎丰子的“战争三部曲”为例探讨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军人”形象。作为中国学者,在肯定这些作品文学价值、社会影响的前提下,更应重视作品中反映出的相对狭隘的历史认知,通过学术批评提醒、帮助日本民众提高认知水平。此外,中国学者还应尽量展现学术主体性,注意在国际社会的学术发声,在密切关注邻国学术动向的过程中,将学术成果进行国际传播,促使日本民众正视历史、反省行为,引领中日间的友好往来。

参考文献

- 鲍同 姜毅然.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大地之子》为例[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2(3).
- 丁跃斌. “他者”语境下的冲绳文学解读[J]. 外语学刊, 2017(2).
- 山折哲雄. 民俗学中的死亡文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宿久高. 日本文学的“超政治性”诤议——以古代文学为中心[J]. 日本学论坛, 2001(3).
- 张锦. 以悲为美——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J]. 外语学刊, 2016(5).
- 前川文夫. 山崎豊子への誘い[M]. 京都: 白地社, 2005.
- 山崎豊子. 不毛地帯(四)[M]. 東京: 新潮社, 1983.
- 山崎豊子. 二つの祖国(下)[M]. 東京: 新潮社, 1986.
- 山崎豊子. 大地の子(四)[M]. 東京: 文藝春秋, 1994.